

網路商業化與網路民主： 資訊政治經濟學觀點下的討論

李明哲

世界新聞大學傳播研究所
mingche@staff.pchome.com.tw

唐志宏

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
建國技術學院
chihung@ckit.edu.tw

摘要

電腦與網路系統逐次興盛之後，對社會各個面向都產生了或多或少的衝擊和影響。在電腦化社會下，民主社會的政治面向與活動，也因網路這一新通訊科技的加入，而產生了一些變化。電腦網路科技所傳遞的是數位資訊，數位資訊不能只和投票制度產生關係，而自外於其他社會領域所產生的影響。資訊社會的本質與文化、資訊商業化的影響、電子形式的溝通模式與意義等等都是要被討論的範圍。本文將以數位資訊商業化，做為討論的核心。

關鍵字：網路民主、網路政治經濟學、資訊資本、資訊社會、
資訊革命、資訊私有化

[收稿]2002/6/10; [初審]2002/6/17; [接受刊登]2002/6/23

一、前言

電腦與網路系統逐次興盛之後，對社會各個面向都產生了或多或少的衝擊和影響。在電腦化社會下，民主社會的政治面向與活動，也因網路這一新通訊科技的加入，而產生了一些變化；例如全民的電腦操作程度，便會影響網路系統和政治活動之間的可能關係(Wilhelm 2000)。

網路民主牽涉到政治和科技這兩個範疇。就政治的面向而言，民主政治是政治的一種形式，其最顯著的政治操作形態，就是投票選舉制度。顯而易見，電腦及網路系統與投票制度的結合，是一種理論和實際上兩者交相揉合可行的方式。然而，政治的範圍不只局限於一種制度而已，一些重要的社會價值實現，例如公平、正義以及社會利益等，才是政治制度優劣的判斷標準。因之，網路民主方式的探討，所要關心的除了增加投票率等民主政治操作的改進外，更重要的是電腦網路系統和投票制度的結合，是否能夠讓重要的社會價值得以更完美的體現？換句話說，網路民主，是否能比傳統的民主操作方式更能實踐人類所追求的社會價值？

就科技面向而言，科技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所涉及的影響面，不會只是單單科技這一面向就可以解釋的；新科技所導出的新溝通媒介形式對社會的影響及改變程度，可能更依賴於社會、政治、經濟面向對科技的認知與使用方向(Bertelsen 1992)。從廣角的歷史縱觀來看，有些學者研究歷史變化和媒體形式變化之間的接榫關係，認為「文明盛衰和一個文明內部的文化變遷，從主要傳播媒介的功能就可以了解大半」(Czitrom 1994: 224)。採用此種取徑的各式研究或有一些歧異(例如 Innis 以及 McLuhan 的觀點)，即使走向分途，也逐漸地有了一個共同的解釋架構：三種不同時期的文化特色，似乎和三種不同的溝通形式，有著一些歷史時間上的湊合形式——傳統社會和口語的媒介形式；現代社會和印刷的媒介形式；當代社會和電子媒介之間的關係(Meyrowitz 1998)。從對數位科技的近距離觀察，Poster(1996:57-77)認為電腦網路系統下的資料庫以及電腦書寫形式，可以有知識論上的

後現代意涵，甚至可以被稱之為「後現代科技」(postmodern technology)(1995)；Gómez-Peña(2000)則認為數位科技會形成新的文化展現形式、新的感觸美感、甚至形成在網路上被使用的新語言。

於是，當電腦網路系統被運用至投票制度時，同時也要考慮電腦網路系統在經濟、文化以及其他社會面向的影響。也就是電腦網路和民主政治的關係，要放在廣義的「資訊社會」架構下來思考。電腦網路科技所傳遞的是數位資訊，數位資訊不能只和投票制度產生關係，而自外於其他社會領域所產生的影響。所以，資訊社會的本質與文化、資訊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 of information)的影響、電子形式的溝通模式與意義，以及虛擬社群中個人主體意識的變化以及資訊暴力、資訊消費等等，都是要被討論的範圍(Webster 1994)。本文將以數位資訊商業化，做為討論的核心。

1970年代，貝爾(Bell)(1979: 42)在歡呼資訊時代來臨之際，曾就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ies)在未來政治上可能產生的影響，做出了預測：科技的自由與競爭使用，是打破私人或公眾領域上獨佔的最佳方式。因此，也是自由的最佳保障。意味著資訊科技所夾帶的網路民主，可以打破政治上的壟斷，創造出一個比傳統民主政治更能實踐的社會價值。

迄今，整個世界已歷經了資訊科技爆炸性的擴張與成長，對於科技未來的想像和重視，也已由對「科技」的重視轉變到對「資訊與通訊」的強調。在目前討論資訊社會的熱潮中，甚至「資訊」儼然已比「科技」更為重要，對未來社會更有影響的潛力(Winston 1998:24)。然而，仍存留幾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民主政治是否因電腦網路科技，在本質上有了某種樣貌上的改變？電腦網路科技運用於政治的意涵上，能否為我們帶來更好的政治方式，來加以解決社會問題？抑或它僅是一項新興的科技產品，仍無法針對民主體質，做更良善的改變？這些問題的解答或探究，也是本文探析的重點。

二、網路化民主政治理論的探討

就理念上而言，民主政治一項重要的特色，是一般的百姓可以表達他們的意見來影響政治的漸向。更重要的是，在民主政治中，一般百姓可以攫取其經驗，來質疑政治人物或是社會精英的想法和觀點(Carey 1995:88)。政治學學者 Ian Shapiro(1994)在論及現在民主政治的潮流時提道：在現代的歷史發展中，民主政治運動的形式，通常是用來挑戰現存政治權力秩序。此一挑戰，來自支持民主政治的人，要求更多的政治參與，以廢除舊有不平等的政治權力結構。

然而，就歷史的實際情況而言，民主理念的政治操作上可區分出三種不同的形式：一是古典希臘的民主形式，這是建立在全體公民藉由言說及辯論上的直接參與；其二是代議政治，公民的意見流向政治代言人；其三則是精英式的民社政治，這假設政黨組織內的精英人士可以反映出公民的意見。大部份關於網路民主政治的理論，仍會以古希臘的民主政治概念以及民主政治的操作，做為理想民主政治討論的起點(Adonis and Mulgan 1994)。換句話說，直接的政治參與是網路民主陣營裡，奉行不渝的原則。他們認為，隨著網路的進步，使得社會中能夠參與政治的人數不斷的增加，因為在資訊科技的環境中，網路化民主可以創造更好的政治參與環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希臘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隸制度的經濟基礎之上。雖然雅典市民可以投票選舉來決定政治的方向，但是佔有社會人口結構中更多人數的奴隸，以及當時的女性，在當時卻是沒有任何政治參與權力(Hacker 1996)。

網路民主的邏輯假設在於：電腦網路科技的特色，可以讓資訊快速、大量而有效的流動，並且可以提供更多元的資訊；在政治議題的決定過程中，資訊科技可以使得更多人參與溝通、協商與辯論，並且使之更有效率。他們認為，如果每個人都可以在網路上連結，並和其他人自由溝通，那麼民主的擴展，將是一種自然而然發生的過程。於是，造成民主進步的最大阻礙，僅存在於「能不能連接上網？」此一課題而已。網路民主在理論上，強調新的資訊科技可以提供更好的方式來教育和啓蒙市民，可以使市民來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並使得市

民有更多的信心，來形成自我的決定(self-determination)(Staton 1994)。然而，網路民主所呈現出來，更為確要的特質，在於可以為傳統民主政治遭遇到的瓶頸，提供良好的解決方式：例如，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投票率的逐年降低、大眾媒體的影響，以及追蹤並確保參政者的責任態度等等問題上(Barnett 1997)。

更進一步的來說，網路民主對於民主政治所帶來的發展性，不只是單獨對民主政治業已熟悉的已開發國家有益，對於非民主國家的政治推動也會有相同的效應——特別是 Internet 已逐漸在全世界普及之後。譬如人權觀察網路組織(Human Rights Watch 1999)，就認為資訊科技對於人權的發展與民主的進步，將有正面的助益，因為資訊科技可以挑戰極權政府對資訊的控制，「人人都是出版社」。同時，高度開發國家長期所享有的大眾媒體控制權，也可能受到挑戰；如此，將進一步的平衡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兩者之間資訊交換不公的現況(Kim & Barnett 1996)。

然而，資訊科技和民主政治之間的發展關係，學者因應的態度，並非都是樂觀的。不少學者對於資訊科技在政治上，所產生的影響力，並不秉持樂觀的看法。該陣營認為，這種網路民主的觀念，有一種「資訊」和「民主」之間的「假設」值得注意：網路民主假設在資訊科技的協助之下，民主政治的政治操作會有嶄新的形式；同時，也假設有了新的資訊科技，新的政治參與意識，將會在公民間形成(Friendland 1996:185)。事實上，這樣的一種資訊與民主參與的假設，並不是網路時代才有。在 1960 年代強調媒介是「我們自己的延伸」的 Marshall McLuhan，在探討電視這個新「冷」媒介所帶來的「參與」效果時，就主張「電視是再部落化至關重要的新傳播媒介」；電視媒介顯示著「返回部落親屬關係的綿密網絡之中，每一個團體成員與人和諧相處。」(Czitrom 1994: 253)然而，這樣的說法，是值得再探討的。

就市民政治意識這點而言，Theodore Roszak(1994:156)曾強調「資訊」(information)不要和「觀念」(ideas)搞混了。充足資訊和民主觀念

發展之間的關係，是否為一必然的關聯？仍有待檢驗；因為「資訊很難是中立的」。有了充份連線的網路系統，互動科技也被充份運用，就科技面而言，人們是有諸多新興工具，可以就政府政策充份的討論和檢視，同時表達看法；但是在這種狀況之下，有了足夠且充份的資訊，人們就可以成爲一個積極主動參與政治、關懷政治的民主市民嗎？(Street 1997)換句話說，對網路民主的樂觀態度持反對看法的人認爲，(資訊)科技的發達與民主的開展兩者之間，並不必然有直接關係。也就是說「更多的資訊不必然會產生更好的理解」(Roszak 1994:165)。顯然的，這裡有一個資訊量與民主品質上的疑問存在。Roszak(1994:165)曾針對這一問題說道：「在一個真正的民主環境下，重要的並不是資訊的數量，而是資訊的品質。」

的確，資訊的品質是很重要，但資訊的數量卻也不容忽視。充分的資訊數量與流通，是民主政治得以充份發展的重要環境。資訊品質的問題，很難有一個明確的界定；假定太強調資訊品質的面向，反倒容易形成精英政治的傾向。對於擔憂網路民主的人士而言，確保大量流通的資訊，堅持自由、公開而不受操控的想法，其關心的程度，可能凌駕於在資訊品質這一要求之上。

在這種觀點下，網路民主的民主操作方式可能會對民主政治的發展帶來幾個問題：一、資訊不平等的擴大會危及大眾的民主參與；二、國家或私人機構對資訊的掌握和控制，會妨礙個人或團體自由表達的機會；三、新形態的市民及公眾生活，會因資訊科技而改變其面貌，但同時也會受資訊的市場力量以及資訊的監控方式所限制(Friedland 1996: 185)。

資訊科技可以讓大眾百姓更有機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資訊，但是這些資訊是否純淨，從未受過其他利益所影響呢？這種憂慮，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待資訊社會下，資訊系統的建置發展與資訊商品化的可能影響。例如 Elshain(1982)認爲，在最壞的狀況下，網路民主的政治參與，有可能如同在電視購物頻道中做商品的購買選擇一樣。

三、資訊政治經濟學觀點下的資訊社會

網路民主這一議題，儘管有支持和懷疑兩派截然不同的論述主張，但其對資訊社會的特色，有一些共同的想法，那就是資訊社會在於「資訊產品的產製，以及資訊產品對於經濟、政治及社會權力的操作上，確實有不同於以往社會之處。」(Hayes and Miller 1994: 117)加以延伸其義，就是現代資訊科技，對於學習、行為以及認知上的影響，不只產生於精英份子身上而已，同時也會擴及一般大眾(Compaine 1988)。同樣的，在政治的參與上、公眾意志的表達以及政權和平轉移等各種政治面向，也會受資訊科技的影響。然而，懷疑陣營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思考，他們會更關心資訊如何產製、傳遞、分配以及使用的過程；同時也是在這一種思考架構中來解釋上述資訊社會可能的變化面貌。

John Eaton(1949: 1-2)在其名著《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說道：「政治經濟學解釋人類如何來生存；它處理人類社會中，生活物質需求的生產與分配問題——食物、衣物、居住與交通等等。它並不只是關心生產的技術面，同時也注意到在製造與交換的過程中，人與人的關係。……在生產製造科技變化的影響之下，人與階級之間的社會關係也跟著改變，同時社會發展的一些原則也會改變。」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而言，歷史的變遷和生產、傳遞、分配以及使用資源的技術發展，兩者有著密切的關係。資源是一種可立即使用或是有使用潛力的東西。石油、海水或是光譜(spectrum)都可以是資源。然而，並不是資源就是「商品」(commodities)。只有在特定的時空中，某種資源才會變轉變成商品。資源可以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被任何人使用；但是商品的使用卻有歷史時空的限定(Schiller 1988: 33)。例如在內燃機發明以前，石油是一種資源。其後，就成爲一種商品了；以水而言，當水可以被當作商品使用時，才會有自來水、礦泉水等等有價的水產品。只有可以成爲商品的資源，這種資源才會進入生產、傳遞、分配以及使用技術的發展流程——也就是商業化。石油及水的商品及商業化對整個社會的發展自有一定的影響，例如大石

油及礦泉水公司的興起、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波灣戰爭、甚至臭氧層的破壞等等。什麼樣的資源可以被轉變成為商品呢？這端視有商品化潛力的資源是否可以在商品化後具有「獲利」的能力！最近的 DNA 熱潮，不也是如此嗎！而獲利可能的強弱，會影響生產、傳遞、分配以及使用技術發展的快慢。

在這樣的一種思維的前提之下，如果資訊不能成為商品，不能成為一種可以獲利的東西，那麼用來生產、傳遞、分配以及使用資訊的技術(資訊技術)，並不會有發展的動因與動力；相同的「不能產生利潤的資訊，也不會被資訊工業所製造。」(Schiller 1981)一旦資訊成為商品，那麼在對利潤的考量之下，則資訊有可能被「稀有化」；因為稀有化是創造商品利潤與價格的一種方式。

從商業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而言，稀少性與效率性是經濟學的兩大主題。「經濟學是研究社會如何使用有限的資源，去生產有價值的商品，並在不同的團體中予以分配。」(Samuelson & Nordhaus 1998: 3) 商品是具有稀少性的，這也是價值的來源。愈稀有的商品，價值愈貴。然而，資訊這種商品可以複製和快速傳遞，尤其是數字資訊，其複製和傳遞的成本幾近於零，而且可以無限而大量複製。既然資訊商品的實質是不具備稀少性，在商業資本主義的邏輯之下，資訊價值的創造便來自於控制資訊的流動方向，或是說控制取得資訊的管道(Morris-Suzuki 1986)。

提倡網路民主的陣營喜歡引用哈伯瑪斯「公共領域」的觀念(Habermas 1989)，來詮釋網路民主可以創造的理想情境。公共領域，在這裡，充份被告知的互動辯論，可以自外於政府、商業團體以及任何限制自由言論的控制，進而開展；再進一步的說，「理想的言說環境，是和理想的生活形式習習相關」(McCarthy 1975: xvii)。對提倡網路民主的人而言，既然現存的各種媒體管道，或多或少都有被政府或商業團體所影響的疑慮，電腦網路系統所形成的資訊空間恰恰是公共領域的一種可能形式。換句話說，數位資訊所形成的虛擬空間扮演了公共空間的角色，在這裡，自由言論的虛擬空間情境，成為可以批判

在現實社會中被扭曲言論的場所(Dahlberg 1998)。

對網路民主持懷疑態度的人而言，網路民主的實施，首先的前提是要有完整的資訊系統網路。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資訊系統網路發展的幅度與速度，正是和資訊商品化發展的幅度與速度一致。再者，在資訊資本主義的運作之下，資訊流動和被取得的方式必須受限制，才能塑造出稀有性以創造價值；因此，傳遞資訊的資訊系統，很容易被建置成爲具有資訊取得限制形式。電腦網路系統的發展與資訊商品化的必然性結合，正是網路民主在政治意涵上最令人覺得不安的核心。

換句話說，在資訊社會下「資訊變成另一種形式的資本」，「對資訊與資訊科技的掌握，提供了新的機會來接近新的政治權力形式」(Locksley 1986: 91)，將會造成資訊及資訊系統的本身，很難絕對的自由、公開而不受資訊所有權者的操控，正如同勞力在資本主義下，勞力轉變成爲資本的情況一樣；這裡的資訊擁有者有可能是私人機構或是政治團體。因之，資訊系統在資訊社會中和社會緊密結合的結果，是傳遞的資訊愈多，反而未必能提供一種公平的資訊；這恰恰與網路民主提倡者所期待的結局是相反的。

四、資訊的商品化的歷史軌跡：私有化

從歐洲歷史發展過程來審視，資本主義原是反抗中古死氣沈沈的基爾特制度，所凝聚的形式。在基爾特的商業系統中，生產與貿易是一種爲整體社會利益(或存在)的活動，而不是爲了個人的獲利。因之，每樣產品服務都有基爾特的公定價格，不允許生產者在獲利的動機下自由的決定價格。與基爾特制度相反，資本主義是一套爲獎賞個人的制度；就一套商業系統而言，資本主義的核心就是要使個人致富。所以，資本主義有三個非常重要的核心特色：私人企業、市場競爭與企業獲利(Burns, Lerner and Meacham 1984: 544-546)。

這樣的一種體系，從資源運用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一

連串的「封圈運動」(enclosures movement)，將許多原屬於公共資產(common property)領域的資源，封圈標示為私有財產(private asset)，從而納入尋求獲利的商業資本主義的運轉體系。這一發展的過程，通常是以「私有化」的過程來呈現。從英國資本主義化的運作來審視，中古時期鄉民共同耕種、共同享有公共領地，這些公共領地在封建時代中有其「宣示主權」的領主，但卻不是領主的私人土地。在十五及十六世紀，這些公共地逐漸的被封圈(enclosure)起來。在這些封圈的土地中，或是將耕地轉為牧地，或是在新農業科技的協助下，重新加以組織土地，以提升生產力。

在這一發展的過程中，這些原本屬於公共財的共有土地，漸漸的被私有化；因為唯有私有化，土地的領主才能將原本耕種在這些土地上的鄉民趕出，以便可以隨心所欲的對土地加以改良或是運用，藉以追求更高的土地收穫。在這一過程中，鄉民和封建土地領主在土地的使用上，必定存在衝突，最後在封建領主為主導勢力的國會帶動之下，通過一連串的圈地法案(acts of enclosure)，使得領主得以合法的擁有封圈土地(Burns, Lerner and Meacham 1984: 558-561)。

如前所述，稀有性是資源轉化成為有價值商品的一種特色，而在人類的社會活動中，私有化則是這一資源轉化為商品過程的展現形式。所以，「資訊要能成為一種可以獲利的商品，是在資訊的私有化是可能的前提之下」(Schiller 1983:251)；於是資訊是公共資產的傳統概念，在此種私有化的前提下被取代了(Jansen 1988)。從這一的角度來觀察，在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之下，從封建公有土地、勞力(labor)到傳統的文字手稿、大眾流行歌謠，一個又一個的傳統公共資產被轉化為私人財產；資訊的私有化，可以被視之為，資本主義另一起封圈運動的接續項目。在這一種資訊資本主義的邏輯之下，任何和資訊相關的活動，尤其是文化領域，都成為一個個新的市場：「愈來愈多的文化生活領域，都為金錢網絡所籠罩，進入了資本計算的邏輯中。」(Harvey 1989:334)

資訊的私有化，使得一些傳統被視之為是公共領域的資訊(public

information)，成爲被私人支配的市場商品，一個個相續失守；相對應的，資訊可以取得的管道也就一再的受到限制。這樣的一種現象，在近代電腦／網路資訊工業蓬勃發展之下，更加明顯，可說是「新一波的封圈運動」(Webster and Robins 1998)。例如，Jansen(1988)觀察道：1980 年後，美國資訊政策的發展，就是回應了資訊私有化的壓力。具體呈現在美國政府逐漸的降低與資訊相關的政府責任，例如減少私人企業要向政府呈報的資訊，縮小聯邦政府可以產製和傳佈的資訊類別、以及對於一些原本可以取得的資訊加以限制。在英國，Elliott(1983)認爲，柴契爾政府爲了資訊工業的市場需求，逐漸的減少政府的一些統計活動，讓私人企業接手參與，進而成爲私人公司的有價商品。

資訊政策逐漸的爲市場競爭所影響，各種領域資訊的所有權，逐步的轉變爲私人企業的領域。這說明資訊在商品化後，於資本主義邏輯下的發展走向；這種趨勢，在以電腦網路科技爲重要社會特色的資訊社會裡，只會更加速而已。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在網路資訊內容工業(Internet Content Industry)裡，「看即收費」(pay-per-view)的呼聲與趨勢，正隨著資訊內容市場商業運轉壓力的加大，而成爲目前的一種主流聲音。

五、結論

在過去的數十年間，對於資訊社會的本質一直有兩派的爭議：其一、在資訊科技的特色之下，所形成的資訊社會，相對於之前的工業(資本)社會，是一種革命性(revolutionary)的社會；其二，則認爲資訊社會只是後工業社會的顯著模式，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另一種演化。這兩種論述涉及到對資訊科技的看法，換言之，如果「工業革命是以機械取代工具，成爲其變革勞動手段爲起點的『生產方式的變革』」(鹽澤君夫、近藤哲生 2001)，那麼溝通／資訊的電子化科技(the electronic technology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相對於以機械及能源爲特色的工業革命，是否在其科技的本質上，能爲目前的社會帶來革命性的改造，而可以被稱之爲「第二次工業革命」(Winston 1997)。

這兩種不同的歷史觀所突顯的，是科技和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認同革命論的一派，基本上是相信科技進步之於社會發展有著主導性的力量。這樣的一種論述，基本上是將科技認為是一種「中性」的人類產物，是一種可以在人類理智的運作之下，有著獨立自主發展性的力量。科技的發展是「純然」人類智慧獨立運作的展現，同時也開放給任何有興趣要利用的人，並不會受到社會外在環境的限制。例如，蒸汽機及內燃機的發明，帶動了工業革命後的歷史發展；因此，資訊科技的誕生，相對的會帶動新的社會發展型態。事實上，諸如「蒸汽時代」、「鐵路時代」、「電力時代」、「原子時代」、「電腦時代」以及最近的「網路時代」、「數位時代」，都是這種科技決定論觀點下的名詞；每一種科技，似乎都可以藉由科技本身上的特質，為人類社會帶來新的革命性的改變。然而，就我們所經驗到的社會發展而言，在科技觀念上有革命性進展的科技，並不必然會為社會或經濟帶來具有革命性的後果(revolutionary consequences)(Gershuny 1992)。

持演進歷史觀的人，則認為科技的發展方向是受社會影響的(socially shaped)；從科技的發明到科技可以在社會中被使用，這一過程，並不是直線的，相反的是會受特定時空中某種社會力量的影響和型塑，然後科技又會回頭過來影響社會。簡言之，兩者之間是一種相互作用形成的過程；「科技本身並不會造成社會的革命」(Cherry 1985: 37)，「科技只有在社會情境中才有意義」(p. 57)。如果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而論，則是強調政治、經濟等的觀點面向，來說明科技發展方向如何和社會力量產生互動(Mackay, 1995)。就媒體科技而言，例如電報在社會的擴大運用，是受當時鐵路工業發展熱潮中的通訊需求以及商家和新聞界的惠顧才得以立足；廣播，當初是無線電器材製造商用來吸引人購買無線電設備的一種服務，最後卻丟棄了撫養它長大的那些火腿族(hams)；現代媒介主要是以商業形式來運作，目的在擴大利潤，而這又是和當代大眾社會(mass society)的發展習習相關。(Czitrom 1994, Winston 1997, Williams 2000)

電腦網路科技的發展，一開始源自於軍事上的需求。電腦是二次大戰中數字統計上的需求；Internet 發展的最重要推重力則是冷戰時

期，在核戰威脅陰影下，爲了「存活通訊」所設計的(Winston 1998)。然而電腦、網路科技的發明，逐漸的成爲所謂資訊工業、進而發展出目前的資訊內容工業形態，則是和資訊商品化這一種資訊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關。也就是，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環境中，資訊被視之爲一種可以獲利的新資源，爲了製造、傳遞和使用資訊的電腦網路資訊工業，也就相應發展；於是，在資訊工業市場的需求壓力下，許多資訊政策也就相應的朝向資訊私有化的方向修正。假定電腦及網路科技是誕生於共產社會式經濟體制的國家，或許今天這兩項科技還只是局限於軍事用途、或驚鴻一瞥於研究單位上而已，不會有個人電腦普及的盛況出現。

因之，資訊社會相較於「前」資訊社會，並不是一種革命性的新社會形態，它是傳統社會在資本主義邏輯下的一種演進形態。新的電腦網路科技只是二十世紀初期通訊科技發展的一種延續而已(Webster and Robins 1998)。從運用流通「資訊」的角度而言，這一演進的形態，是從電報、廣播、電視等各個通訊資訊科技，再進一步轉變到電腦網路科技的一個連續歷程(Webster and Robins 1989)。因之，電腦網路科技並不會有魔術般的新科技力量，對已存的民主政治現狀帶來無法想像的革命性改變。

電腦網路科技會帶來資訊自由(freedom of information)，是網路民主的一個重要支柱論點；以爲資訊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前提。從抽象的理論上而言，這是正確的。然而，一旦將此一說法放入目前生活的社會時空加以檢驗，就會產生問題。網路民主要可行，電腦網路系統就必須和社會結構充份結合；可是目前以資本主義經濟爲特色的社會中，電腦網路系統的發展，必然要有電腦網路工業及內容資訊工業的發展，做爲其推動擴張的後盾。如此，資訊的商品化、商業化與集中化，將會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但是這樣的趨勢，卻是和資訊自由相互抵觸。誠如 Williams(1994)所擔心的，除非有適當的規範加以介入，無限制的私有和控制，將會使資訊的選擇狹窄、資訊的多樣性受到壓制。如此，資訊科技所帶來的將會是資訊貴族政治，而不是數位民主！

參考書目

- 鹽澤君夫、近藤哲生 (2001) 《經濟史入門：馬克思經濟學歷史理論概述》，黃紹恆(譯)，台北市：經濟新潮社。
- Adonis, A. and Mulgan, G. (1994) 'Back to Greece: The Scope for Direct Democracy', *Demos Quarterly* 3: 2-9.
- Barnett, S. (1997) 'New Media, Old Problems: New 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2): 193-218.
- Bell, D. (1979)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y-June: 20-42.
- Bertelsen, D.A. (1992) 'Media Forms and Government: Democracy as an Archetypal Image in the Electronic Age',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40: 325-37.
- Burns, E. M., Lerner, R. E. & Meacham, S. (1984)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 Carey, J.W. (1995) 'Abolishing the Old Spirit World',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2(1): 82-88.
- Cherry, C. (1985) *The Age of Acces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Revolution*. London: Croom Helm.
- Compaine, B.M. (1988)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Change: Toward A New Literacy', in B.M. Compaine (ed.) *Issues in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orwood, New Jersey: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Czitrom, D. J.(1994) 《美國大眾傳播思潮》，陳世敏(譯)，台北市：遠流出版社。
- Dahlberg, L. (1998) 'Cyberspace and the public Sphere: Exploring the Democratic Potential of the Net', *Convergence* 4(1): 70-84.
- Eaton, J. (1949) *Political Economy: A Marxist Textbook*.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LTD.
- Elliott, P. (1983) 'Intellectual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he

- Disappearance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E. Wartella, D.C. Whitney, and S. Windahl (eds.)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 Vol. 4*. Beverly Hills: Sage.
- Elshtain, J.B. (1982) ‘Democracy and the QUBE Tube’, *The Nation* 7-14 August: 108-109.
- Friedland, L.A. (1996) ‘Electronic democracy and the new citizenship’,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8: 185-212.
- Gershuny, J. (1992) ‘Revolutionary Technologies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in R. Silverstone and E. Hirsch (eds) *Consuming Technolog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Gómez-Peña, G.(2000) ‘The Virtual Barrio @ The Other Frontier’, in J. T. Caldwell (ed.) *Electronic Media and Technoculture*.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homas Burger with Frederick Lawrence, Trans. Cambridge: MIT Press.
- Hacker, K.L. (1996) ‘Missing links in the evolution of electronic democratiza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8: 213-232.
-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Hayes, S. and L. Miller (1994) ‘Informed control: Dun & Bradstreet and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6: 117-140.
- Human Rights Watch (1999) *The Internet in the Mideast and North Africa: Free Expression and Censorship*. Available at (<http://www.hrw.org/advocacy/internet/mena/index.htm>),2002/02/11
- Jansen, S.C. (1988) *Censorship: The Knot That Binds Power and Knowled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m, K. and Barnett, G. A. (1996)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A network Analysi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3): 323-352.
- Locksley, G. (1986)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 Capital and Class* 27: 81-105.
- Mackay, H. (1995) 'Theorising the IT/Society Relationship', in N. Heap, R. Thomas, G. Einon, R. Mason and H. Mackay (e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London: SAGE.
- McCarthy, T. (1975)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J.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trans. By T.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 Morris-Suzuki, T. (1986) 'Capitalism in the Computer Age', *New Left Review* 160: 81-91.
- Poster, M (1995) *CyberDemocracy: Internet and the Public sphere*. Available at <http://www.humanities.uci.edu/mposter/writings/democ.html>, 2002/02/11.
- Poster, M. (1996) *The Second Media Ag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Roszak, T. (1994) *The Cult of Information*.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amuelson, P. A. and Nordhaus, W. D. (1998) 《經濟學》，吳文清(譯)，台北：西書出版社。
- Schiller, D. (1988)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in V. Mosco and J. Wasko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Schiller, H.I. (1981) *Who Knows: 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 Norwood, N.J.: Ablex.
- Schiller, H.I. (1983) 'Critical Research in the Information A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3): 249-257.
- Shapiro, I. (1994) 'Three Ways to be a Democrat', *Political Theory* 22: 124-151.
- Staton, C.D. (1994) 'Democracy's Quantum Leap', *Demos Quarterly* 3: 31-32.
- Street, J. (1997) 'Remote Control? Politics, Technology and 'Electronic Democrac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1): 27-42.
- Webster, F. (1994) 'What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0: 1-23.

- Webster, F. and Robins, K. (1989) 'Plan and Control: Toward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ory and Society*: 323-51.
- Webster, F. and Robins, K. (1998) 'The Iron Cage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1): 23-45.
- Williams, L. (1994) 'Three Paradoxes of the Information Age', in G. Bender and T. Drackrey (eds) *Culture on the Brink: Ideologies of Technology*. Seattle, WA: Bay Press.
- Williams, R. (2000) 'The Technology and the Society', in J. T. Caldwell (ed.) *Electronic Media and Technoculture*.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Winston, B. (1997) 'Reviews: Jon Dovey (ed.), *Fractal Dreams: New Media in Social Context*.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6.',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1): 119-121.
- Winston, B. (1998) *Media Technology and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ommercial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CyberDemocracy: A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Political Economy

Mingche Lee

Graduat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Chih-Hung Tong

Dep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cent social chang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ing and the Net technologies. On the Internet, it is said that the new technologies would enhance a better operation of democratic systems and bring about new consciousness of citizenship in term of CyberDemocracy. However, it would be incomplete to 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t and democracy as a direct 'cause and consequence'. Other social aspects such as the nature of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the new forms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discussed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Net on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opic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content.

Key Words : CyberDemocracy, information society,
information capital, information commodity, Internet.